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XIA XUE SHANG DA
XUE YI FU XING
JIAO HONG SI XIANG YAN JIU

白静 著

下学上达，学以复性 ——焦竑思想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XIA XUE SHANG DA
XUE YI FU XING
JIAO HONG SI XIANG YAN JIU

下学上达，学以复性 ——焦竑思想研究

白静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学上达,学以复性/白静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8
ISBN 978-7-5657-0780-3

I. ①下… II. ①白… III. ①焦竑(1540~162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 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5927 号

下学上达,学以复性

著 者 白 静

责任编辑 赵丽华

责任印制 张 玥

封面制作 飞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780-3/B·078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1

第一章 焦竑的道家思想 / 15

第一节 《老子翼》研究 / 15

第二节 《庄子翼》研究 / 40

第二章 焦竑的佛学思想 / 65

第一节 焦竑的佛教交游 / 67

第二节 焦竑四种《精解评林》研究 / 89

第三节 焦竑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的佛学思想 / 109

第三章 焦竑的心学思想 / 129

第一节 “下学而上达”——焦竑“复性说” / 129

第二节 焦竑师从罗近溪考辨 / 144

第三节 切磋琢磨——焦竑从容中道学术品格的由来 / 165

第四章 焦竑的文学思想 / 203

第一节 “性灵”与“性情”之辩 / 203

第二节 焦竑以禅意为最高境界的诗学观 / 238

参考文献 / 268

后 记 / 275

绪 论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南京人,是晚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是阳明后学中坚力量。研究这样一位思想大家的文学思想,先厘清他的儒、释、道三家之学非常必要,因为“有本之学”^①是焦竑最重要的学术精神。这个“本”即指儒、释、道三家的性命之学,亦即焦竑所谓的“道”。焦竑的学生陈懿典在为焦氏《澹园集》所作序文称:“(先生)学先闻道,故尽洗文人之习气。以明道、象山之见解,运昌黎、南丰之笔力,语无不透,说必有据。即使博如子政,奥如子云,不能傲之以所不知;虽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不敢谓此儒者不闲于词,而独逊此席也。”^②对焦竑文章成就的评价虽有过高之嫌,但却准确概括了焦竑文本于道的文学思想。焦竑所谓的“道”,并不只是儒家之“道”,而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之学,内涵颇为丰富。故而必须先究明其“道”。近些年来学界对焦竑文学思想的研究,较少从儒、释、道三家思想大背景上来进行深入考察的著述。因此本书拟先明其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再谈他的文学思想。

① 焦竑:《答乐礼部》,《澹园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3页。

② 陈懿典:《尊师澹园先生集序》,见《澹园集》附编二,同上,第1214页。

一、焦竑研究现状

对焦竑在学术上的地位,最早论及的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在《明儒学案》中将焦竑列在“泰州学案”下,称“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弼州所不如”^①。阳明学之流传,“讲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黄宗羲十分称道焦竑对于王学流传的影响,但是对他“以佛学即为圣学”^②和友善李贽非常不满。清人论焦竑一般皆祖述黄宗羲,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称赞焦竑博洽,但也认为“(竑)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③。对焦竑学杂释、道极力诋毁。真正意义上的焦竑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④,容氏认为焦竑“笃信李贽”,“是王守仁、王艮一派的后劲”,“是最博学而又注重于内的修养的一人”。由于焦竑注重向内的一路,“故此大胆的承认佛经所说”,“认为孔门的学问亦在于‘空’”、“人性本是空”,故而主张“复性”。同时容肇祖还指出焦竑“重行检”,“有惩泰州后辈放任之失”,很有“实用主义色彩”。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鼓应等人的《明清实学思潮史》^⑤认为王学取代诸学而居社会主导地位,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明末,王学末流抛弃了王学的反传统精神,日益流于空疏。一些有识之士从王学中分化出来,引导王学向实学发展,渐渐形成王学的改造派,成为实

① 黄宗羲:《泰州学案四》之《文端焦澹园先生竑》,《明儒学案》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29页。

② 同上。

③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五子部三十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④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七章,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以下引用皆出此处。

⑤ 陈鼓应:《明清实学思潮史》卷十八,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

学的一支劲旅,其代表人物就有焦竑。焦竑颇重小学工夫,首开古书辨伪之风,在诗经研究中发现“古诗无叶音”,这对于明清考据学的发展贡献甚大。陈氏着重论述了焦竑的实学并且强调焦竑同于李贽的异端色彩。

21 世纪初,张学智著《明代哲学史》^①中有《焦竑的儒释道三学》一章,对焦竑的分析代表了焦竑研究的新水平。张学智综合考察了焦竑儒、释、道三教思想,以为他在泰州后学中“别开一脉”,“既有王艮的平实与切己,又避免了他的固执与单薄;既有何心隐、李贽发皇自立、尊身信己的精神,又避免了他们理论上过于愤激、行为上过于恣纵的弱点”,“与其师耿定向亦不同,耿定向之学止于四书和佛学,过于拘迫且倾向于实际事务,焦竑则参之经史,规模阔大,其学有极浓的学院气息”^②。张学智指出在“情与性”关系上,焦竑主张因性生情,化情返性,体认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表明他在性情关系论上是不同于王襞、罗汝芳也不同于何心隐、李贽的温和派”,并进一步指出,“他这种温和的态度和乃师耿定向最为接近”。可以说把握住了焦竑“学”的精髓。在佛教问题上,张学智认为焦竑受耿定向、罗汝芳、李贽影响,但“对于佛家思想的吸收,不像耿定向那样是外在的借佛说儒,而是更与罗汝芳与李贽相像,儒学佛学水乳交融”。又指出焦竑的“礼”即“理”说,认为焦竑的这种形而上的解释是角度全新的,在明代儒家中很少见。这个问题一直被前人所忽略。但张学智说焦竑是“蹈袭前人成说者多,自创新意者少”^③,笔者认为这正是焦竑从容中道精神之最佳体现。

2005 年刘海滨的博士论文《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④,提出“王学会通派”的概念,其根本的立场是将阳明后学分为正统、修正、师道、会

①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② 同上,第 283 页。

③ 同上。

④ 刘海滨:《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复旦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

通四派,而作者之所以没有采用“三教合一”而是使用了“会通”一词^①,因为会通派重在会通天下学术,乃至于会通思想超越理论本身而进入其他领域影响王学以外的人,从而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会通思潮。笔者以为这样的划分虽然有可能厘清阳明后学一些错综复杂的理论命题,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则有失之太泛之弊。就焦竑而言,他虽有会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但却并没有接受当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思想,可见其会通思想并非没有疆域。

文学研究界对于焦竑的研究,较早有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②,认为焦竑同李贽一样均是公安派的先驱。但是他认为三袁是诗人,焦竑是学者,“他论诗论文的主张,纵欲与公安合,仍不能不与公安异”。同者在对七子之攻击与宗尚苏、白;异者在“公安有意矫枉,而弱侯尚庶几‘允执厥中’。”认为“矫枉过正,公安之弊,殆亦与七子相同”,但“大体说来,公安三袁是受到他的一部分的影响的,不过因为稍偏,所以只能做到焦氏的一半工夫罢了。”^③到了 90 年代初,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出,将焦竑放在《万历时期七子派、公安派之外的其他诸家》^④一节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认为焦竑从儒学观点出发,论文重在实;从释、道观点出发,论文则重在悟与神。以为二者并不矛盾,正是焦竑思想上力求三教合一的表现。但“他的三教合一论,与袁宗道、陶望龄等相比,似偏于儒,偏于经世致用之学。以故明末文风由尚虚转为尚实,焦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⑤较

① 此前对于焦竑的研究,一般将其思想定性为“三教合一”,如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中对焦竑的研究即采用此种说法。而刘海波“会通”一说的提出,旨在说明焦竑思想之融合性,不局限于儒释道三家,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融合性质,故而称为“这种态度可能会超出理论本身,而进入其他领域和影响王学以外的人”(见刘海波《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一文,第 6 页。)

②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

③ 同上,第 221-223 页。

④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⑤ 同上,第 493 页。

明确地从“三教合一”角度阐述焦竑的文学思想。书中指出焦竑文学思想与七子派有很大区别,与公安派标榜的抒发性灵也自不同;焦竑虽也提到“性灵”,但是与他所主张的“性情”同样,其内涵也是与李贽的“童心说”不同;同时指出焦竑重视诗歌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前承刘基,后启陈子龙,对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①可见,此时对焦竑文学思想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他与李贽及三袁的异质之处,但尚不能给出他们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21 世纪初,周群著《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②一书,从儒、释、道三教与文学相关联的角度研究晚明文学思潮。作者认为“文学与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尤其是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③虽然该书《焦竑亦“灵”亦“实”的文论》^④一章只从“融通儒释”^⑤的角度来考察焦竑的文论,并未涉及焦竑的道家思想,但作为一种研究新视角,作者将明代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

李剑雄自 1981 年以来先后点校出版了焦竑的史料笔记《玉堂丛语》^⑥、《焦氏笔乘》^⑦和焦竑重要的文集《澹园集》^⑧,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澹园集》后辑录了一些焦竑的佚文,搜罗甚勤。李先生又于 1998 年出版了《焦竑评传》^⑨一书,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考据学、史论、文学思想等方面对焦竑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

中国台湾地区及海外对于焦竑的专门研究有如下成果:1975 年,

①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

③ 同上,第 1 页。

④ 同上,第 140—156 页。

⑤ 同上,第 141 页。

⑥ 焦竑:《玉堂丛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版。

⑦ 焦竑:《焦氏笔乘》,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

⑧ 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

⑨ 李剑雄:《焦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哥伦比亚大学的钱新祖发表了《焦竑对程朱理学的反驳》^①一文,从考证学发展的角度论证晚明王学左派对程朱学派的反叛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一个源头,而焦竑在其中更是居于领袖地位。其后,钱新祖在此文的基础上改写成他的著作《焦竑与晚明新儒学的重构》^②,1988年余英时为该书写了书评:《重访焦竑的思想世界》^③,认为焦竑“三教合一”思想来源于王畿,但同时强调不能因为这样“低估其重要性,像其他任何历史中的思想家一样,只有当历史学家找到他在思想世界中所处的恰当位置时,他才能被真正理解。”^④从而肯定了焦竑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此外,余英时否定了钱新祖关于清代考据学来源于泰州王学一派的观点,而认定其与程朱,特别是朱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关于这段论争,《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3月出版的为纪念钱新祖教授的特刊中梅广《钱新祖教授与焦竑的再发现》^⑤一文有详尽的论述,这些文章拓宽了研究焦竑的视角,并给笔者一些启发,如余英时称焦竑三教合一思想几乎全源于王畿,其实不尽然,焦竑的道家思想显然不同于王畿,故而,他的三教合一思想的内涵也不完全等同于王畿。

2001年谢京恩的硕士论文《焦竑与佛教》^⑥首次对焦竑的佛学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将焦竑定位为“心学家中的佛教居士”^⑦,此研究对焦竑与佛教关系的探讨有筌路蓝缕之功。2006年施锡美的《焦竑

① Edward T. Ch'ien, "Chiao Hung and the Revolt against Ch'eng - Chu Orthodoxy," 收入 (Wm.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 - Confucia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71 - 303.

②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 -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收入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一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同上,第84页。

⑤ 梅广:《钱新祖教授与焦竑的再发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第二十九期,第1-37页。

⑥ 谢京恩:《焦竑与佛教》,台湾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 同上,第45页。

《庄子翼》研究》^①一书借焦竑《庄子翼》一书,阐明焦竑融通儒、释、道三家的具体内涵,但因对焦竑《庄子翼》一些基本思想的误读,如焦竑对郭象注看法的认识,使得文章的结论有所偏失。另又有洪芬馨《焦竑〈老子翼〉研究》一书,惜笔者未能目睹。

除这些专门论著之外,台湾尚有1986年林庆彰的《明代考据学研究》^②一书,其中有关于焦竑的专门章节,该文承认焦竑在明清考据学史上的价值,但认为他始终是一个处于心学与考据学之间的“两截”人物,其根本原因还是作者认为考据学与心学是根本对立的。此外,2005年龚鹏程《晚明思潮》^③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论述焦竑,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论证焦竑在晚明思想史中的地位与意义,深入、扼要地论述了焦竑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焦竑在晚明思想界的地位,在焦竑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思路

焦竑博极群书,学识宏富。其在心学、老庄学、佛学、史学、博古考证、诗文评等方面均有很高成就。自郭绍虞起,即注重焦竑“道”与“学”对其论诗论文主张的影响^④,龚鹏程、周群等人更具体从儒、释、道三教着眼,来谈焦竑之文论。2010年杜书瀛指出,“诗文评”这个概念为焦竑首创,反映了他对于文学独立性的认识;同时,杜先生进一步

① 施锡美:《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19册之《焦竑〈庄子翼〉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

③ 龚鹏程:《晚明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④ 郭绍虞先生指出:“惟弱侯则于道所得者深,于学所得者博,而文又足以达之……盖弱侯于道,以佛学为圣学,谓老、庄同孔、孟,所以与东坡之学为近。”又“焦氏也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以发为文章,当然会有此种论文见解。”皆是从事文、道关系着眼。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

指出:“中国古代‘诗文评’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以‘善’为核心的伦理哲学”^①,阐明这一伦理哲学的特殊性表现为以三教合一为学术背景,身为心学领袖人物的焦竑,他的形而上层面的学术思想对其史学、博古考证、诗文评等方面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各位前辈对焦竑的研究,使得这位历史人物的形象逐渐丰盈饱满,当我们不再平面地看待焦竑,而是将其放置在一个立体交叉的空间中来重新审视时,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圆融有机,自成一统。他所讲的道,就是他的性命之学;他的性命之学即由儒、释、道三教构成;他的文本乎道,自性命流出,是其性命之学的自然体现。故而,本书的研究思路即是先明其学术梗概,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他的文学思想。具体而言,分为如下四章来进行论述:

第一章论述焦竑的道家思想。焦竑的道家思想定型较早,再加上他晚年入佛较深,道家思想的变化很少,故而本书的首章阐述他的道家思想。焦竑的道家思想是其“会通”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也是历来焦竑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本章旨在龚鹏程所论的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龚先生没有细论焦竑的《老子翼》与《庄子翼》,而着重在焦竑对《道藏》的充分利用和“摄道归佛”^②思想,故给本章留下较大的继续论述空间。该章分作“《老子翼》研究”和“《庄子翼》研究”两节。第一节旨在阐明焦竑注“老”的用意。焦竑注“老”不选魏晋至唐代注“老”,其真正目的是斥伪还真,即摒弃将《老子》神仙化的道教,还《老子》清静无为之道家哲学本来面目;而其选取宋注,是因为宋注主要特征之一是以复性说论

① 杜书瀛:《从“诗文评”到“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页。

② 龚先生在《晚明思潮》一书中论述焦竑思想的一章称为《摄道归佛的儒者:焦竑》,是对焦竑总体思想的一个精准把握。但笔者不同意龚先生认为焦竑写作《老子翼》和《庄子翼》时也是基于“对死亡的恐惧”的观点,而是认为此时是焦竑构建其以儒家成圣情怀为旨归的性命之学的关键时期之一,详见笔者第一章所论。龚先生文见《晚明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7-114页。

道,学本复性,是焦竑的主要论学思想,宋注藉由注“老”而阐发其复性思想,是焦竑《老子翼》最为关注的一点;另外,宋注普遍以释解“老”,乃是因为佛教高度的思辨能力有助于注家从心性的角度把握《老子》的元旨,即所谓援释解“老”,而并非单纯的信仰佛教,焦竑以释解“老”的本意也是如此。

第二节阐明焦竑以儒解“庄”的宗旨,即何为圣人之道。焦竑《庄子翼》一书,沿《老子翼》体例,采撷众家注“庄”精华,参己《笔乘》以成书,不特《笔乘》以明一己注“庄”宗旨,更以去取旧注以彰显其注“庄”之真精神。《庄子翼》全书本着以儒解“庄”的宗旨,强调的是圣人地位的独尊,阐明的要点是何为圣人之道,与其《老子翼》“即无以证有”的思想一脉相承。《笔乘》集中阐述了圣人与有无的关系,即《老子》所谓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将圣人放置在高于佛老的地位。有些研究者认为《庄子翼》以佛解“庄”,其实,以佛解“庄”根本不是《庄子翼》的主要思想,整本《庄子翼》阐发的皆是“老子以虚空不毁万物为实”这句话,即“即有以证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学以上达”的“一贯”之学,此为焦竑复性说之真正内涵。《老子翼》、《庄子翼》是焦竑中年的著述,体现的正是他努力打通儒释道三教的阶段性思想,他对于心学的探索还在进行中,此后,对在这里提出的复性、有无等思想焦竑予以进一步完善。

第二章论述焦竑的佛学思想。佛学思想是焦竑性命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体把握焦竑的思想非常重要,忽略了这一部分,根本谈不上对焦竑思想的掌握。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本着知人论世的观点,首先来探讨他在佛教方面的交友情况,由于焦竑心学学者的身份,其佛教交友主要集中在同居士亦即圣严法师所谓的“左派的阳明学者”、“理学家之中的佛教徒”的交友,本节选取陶望龄和管志道为例,来考察他们之间在佛教方面的交友以及相互影响。陶、管二人均是在焦竑的中晚年时期与之交往十分密切,但在佛学思想上,他们与焦竑

又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比考察可知,焦竑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前,其“性命之学”的内涵异于陶望龄、袁宏道等人以“了生死”为究竟的思想,而是更倾向于三教同道思想的确立;同样,晚年的焦竑则由禅而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禅净融合态势。结合与管志道的交游我们可进一步得知,焦竑佛教交游重心是儒佛异同以及三教关系之辨析,另一部分是重在辨析性命之学的根本内核,其关心的核心问题不是单纯的佛家义理,故而,其交往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同时代的高僧大德,而是所谓的“宰官居士”们。

第二节为焦竑四种《精解评林》研究,这一节的内容前人研究中几乎没有涉及过,笔者发现这四部书对于把握焦竑的佛学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藉由《楞伽经精解评林》,焦竑阐发了他即心是佛的祖师禅精神:首先,在渐顿问题上,焦竑主张顿悟;其次,焦竑不主张秘密禅,对如来禅也不甚关心,而以着重从心法上修的祖师禅为究竟。此外,该《精解评林》选取主要注家为洪武年间两位奉旨僧人宗泐、如玘,焦竑此部经解旨在融混儒释,确如吴信如先生所称,是儒者而注佛经,自有其用意。《圆觉经》流传之版本比较统一,该经为顿教大乘,亦摄渐修群品,与《华严》同为圆顿之教,从《大方广圆觉经精解评林》研究可知,焦竑对此经之经义深为赞同。该经解主要选取华严宗五祖宗密之注,宗密注的很大一个特点便是融通儒释道,明人士大夫中注解《圆觉经》的只有焦竑一人,其融会贯通之努力可见一斑。在《法华经精解评林》中,体现出焦竑对《法华经》义理内容的认可,该经解选取的注家是世称“温陵大师”的宋代临济宗黄龙派禅僧戒环,温陵注本唐李玄通《华严经论》,亦体现了一种融通思想。相较于其他三部经典,焦竑《楞严经精解评林》一书中对《楞严经》的删节最少,此经是一部对中国佛教之禅、净、律、密教都有广泛和深刻影响的大乘佛教,对于该经的注疏尤以明代为盛。焦竑此经解主要选取温陵、惟则之注,体现了一种禅、教融合立场。通过对这四部《精解评林》的

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得知,焦竑倾向于禅宗“明心见性”与“顿悟”一派,对晚明禅、教融合趋势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同时,焦竑反对“泥”于佛之“教”,通过删汰经文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持咒等密教法门的不赞同。

第三节为焦竑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的佛学思想研究。通过此节的研究,首先我们可以知道,焦竑对于禅宗,尤其是临济宗有很深的认同感,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禅宗一系能解决焦竑关注的根本问题,即生死心的问题。基于此,焦竑排斥默照禅与渐修。但晚年的焦竑对其早期观点有所修正,万历三十四年,焦竑在其《崇正堂问答》中称“余意理须顿悟,事则渐修。顿悟易,渐修难”是基于对晚明狂乱现状的反驳,同时也是对《楞伽经》原文真经的一种回归。其次,通过焦竑对唐初李玄通《华严新论》以及唐末永明延寿《宗镜录》的重视,结合他自身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得知,焦竑对于永明所倡导的延续宗密禅教一致观非常赞同。所谓禅教一致,亦即以“华严”教体融会禅宗“顿悟”实践的观点。基于此,焦竑对明末风气很盛的“唯识”并不关心,而这种不关心并不是如龚鹏程先生所说唯识与焦竑所关心的问题不干切,而是因为从华严判教立场来看,唯识仅高于小乘,为大乘始教,焦竑站在华严一系的立场上,自然而言对于唯识不是很感兴趣。此外,虽然焦竑甚少言及他对净土宗的看法,但结合一些史料,我们还是可以肯定焦竑晚年参修净土。通过对焦竑佛学思想的整体研究,可以进一步很好地把握他的心学和文学思想。

第三章为焦竑的心学思想研究。此章分为三节,第一节着重阐述焦竑“下学而上达”的“复性说”,结合前两章的研究,可知,焦竑正是在参汇释、道的前提下,提出下学以上达、以期到达学的最高境界,即圣人境界的复性说。焦竑对所复之性的看法,几经二变。本节注重考察焦竑复性说的变迁,这一点以前的研究者一直忽略了。焦竑早期论性之说较质实,并不掺杂释、道;中年以后,焦竑重在讲性之无善无恶;

晚年,他又对性为无善无恶的说法进行了修正。总体来说,焦竑作为一名儒者,其本怀是以成圣为目的,故而一生都在追求何为真正的性命之学,他的性命之学由早期参会释、道,而最终落实回孔、孟,重新将学之门径引回孔、孟之康庄大道。孔门之中,颜回最称好学,其最终虽与孔子尚有一间之隔,但其乐学精神真正符合孔子一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无限期下学以上达的生命过程。焦竑重颜回,其关捩正在于此。

第二节考辨焦竑师从罗近溪说的正确与否。《明儒学案》称焦竑“师事耿天台、罗近溪,而又笃信卓吾之学”^①,并称焦竑讲学以罗近溪为宗,但从焦竑现存文集中无法找到焦竑称罗近溪为师尊的说法;相反,从李贽和耿定向的文集中,可以考察到焦竑对罗近溪有不甚满意的态度,这个现象在之前焦竑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笔者认为焦竑在罗近溪生前并没有尊其为师的可能性,其一是因为焦竑对于近溪不满,缘由是近溪惑于方士的行为,而焦竑的性命之学认为“学不能破死生,纵极玄奥,皆分外事也”^②。其二,近溪论学并未区分孩童和赤子,而焦竑认为孩童是“已发”;近溪认为人人均能成圣,而焦竑将学道之士分为上士、下士,且认为下士只能下达,焦竑此一分疏杜绝了中庸流于无忌惮的可能性。故而,焦竑没有“师事”近溪的可能性;反之,“质疑”^③说更为符合事实。

第三节探究焦竑从容中道学术品格的由来,本节旨在考辨王襞、李贽、耿定向三人对焦竑心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焦竑受耿定向的影响更为深长。焦竑虽歆慕王襞乐学精神,

① 黄宗羲:《文端焦澹园先生竑》,《明儒学案》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9页。

② 焦竑:《答万纯初》,《澹园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4页。

③ 《金陵通传·焦竑传》只说焦竑“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复质疑于罗汝芳”,并未说焦竑师事罗近溪,其说较为稳妥。转引自《澹园集》附编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32页。